

徐泰来著

洋务运动新论

周谷城题



洋务运动新论

徐泰来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洋务运动新论

徐泰来 著

责任编辑：邓潭洲 李建国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28,000 印张：14.75 印数：1——1,400

统一书号：11109·395 定价：3.35元

新书目：86—12,13

序

陈旭麓

前几年对洋务运动的讨论，是“文革”后史学领域中论争最为热烈的课题，也成为理论界关心的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影响及于国外，日、美、苏、英、法等国的研究中国的学者也纷纷发表意见。

发生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洋务运动，何以会在八十余年后成为这样热门的论题？因为它曾经是近代中国政坛上争执了三十年的走怎样的政治道路的问题，有着极为复杂的内在和外来的关系。洋务运动之后的前四十年中，虽然也偶有人对它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但大都是见仁见智，语多片面，甚至有的从反动的政治立场出发，强史就我，更为荒唐。后四十年中，为了廓清前此的误解或曲解，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一致的看法，论定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是地主阶级勾结帝国主义的产物，性质是反动的。然而，人们对重大的复杂的历史进程的认识，即使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往往要经过反复探讨，并在后来的艰巨政治实践中，回顾历史，对比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论断。所以，对洋务运动进行多层次的深入的讨论，我想决不是哪几个人的偏好，或者别有怀抱，而是历史的脚步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再认识。

在这场讨论中，湘潭大学徐泰来同志是一个积极的争鸣

者。1980年4月，他发表了《也评洋务运动》一文，“也评”就是对既评的论争。在这篇文章中，他把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看作相互连结的历史过程，认为“洋务运动不是中国封建势力与外国侵略者勾结的产物，而是它们之间的矛盾产物”，“是一个具有进步性的运动”。这些论点与久已形成的观念异趋，一时成为论矢之的。徐泰来同志锲而不舍，围绕上述论旨，连续撰写文章，从理论和史实方面发挥自己的见解，并在许多讨论会上侃侃争辩，表现了可贵的坚持理论思维的勇气，被呼为“徐洋务。”

现在，徐泰来同志把自己所撰的文章辑为《洋务运动新论》付梓，这既是他的辛勤耕耘的纪录，又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洋务运动论争的主旨及其所涉范围。其中与章鸣九同志合写的《洋务运动研究回顾》，综述了从梁启超以来对洋务运动研究的历史，考察了各种论述的得失，针砭了以对洋务运动的肯定与否是反动与革命的分野的形而上学观点，为评价洋务运动提供了大量论据。

洋务运动讨论的热潮似已过去，但研究正在深入。经过几年来的讨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洋务涉及的内容与是非，论者虽仍互有异同，但对洋务企业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设施，承认它为近代中国迎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新学的人越来越多。已有不少同志在广泛地搜集资料，埋头编著洋务运动专著，将全面地论证它的历史作用。由于人们对洋务运动作为近代中国实行政治社会改革的最初阶段的运动，已从具体的史实中得到说明，因而引发着人们对近代史的线索和结构进行新的探索。这种情况表明，学术上的争鸣是发展和繁荣文化科学的必由之路。

1986年元旦于上海长风公园傍

目 录

序.....	陈旭麓
洋务运动述论.....	(1)
也评洋务运动.....	(146)
关于洋务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177)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与洋务运动研究.....	(183)
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	(197)
试论洋务运动发生的原因.....	(227)
试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	(244)
不能将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对立起来.....	(257)
封建主义与洋务运动.....	(263)
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	(278)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	(294)
左宗棠办洋务论.....	(313)
左宗棠的外交思想.....	(330)
关于左宗棠与“军阀”及“亲法”问题.....	(337)
洋务运动大事记 (1860——1895)	(349)
后记.....	(449)
附录：参考书目	(451)

洋务运动述论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朝政府中一部分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掀起了一个延续几十年的社会改革运动。由于这个运动以办洋务为其特征，故后人名之为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的概念 “洋务”一词由“夷务”演化而来。古时，华夏称东方文化落后的民族为“夷”，后来，“夷”就泛指外国。中国本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文明进程里，走在前列。一个对中国文化做了许多研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说：“当我们还是野蛮人的时候，中国这个民族已有了高度的文明。”但历史进入十九世纪以后，中国日趋衰落，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因开展了工业革命，日趋强盛，跑在中国的前面。然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仍昧于中外形势，“竟不知海外更有九州，”^①他们执行闭关锁国政策，以天朝上国自居，而称那已经踏入资本主义文明轨道的外国为“夷”，称外国人为“夷人”，把与“夷人”交涉、通商等事称之为“夷务”。英人赫德曾说：清朝“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②威妥玛也说：“中华天子尊崇最上，者国之君，果欲相交，尚以不能平行。”^③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盲目自大的思想。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十八。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32页。

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觉得中国贬称他们为“夷”，同他们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因而感到羞辱。1842年《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对清政府的代表、前吉林副都统威龄说：“夷之不美，嗣后望勿使用”。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①但终因英方强硬和中国国势已衰，从此以后，清政府在与外国签订条约和外交文件中，就不再使用“夷”字了。然而，那时清廷内部文件和私人著作中，依旧使用“夷人”、“夷务”之词。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咸、同二朝的仍叫《筹办夷务始末》。南京条约签订后成书的《海国图志》仍说“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社会存在变了，人们意识的相应变化总是落后些。

这种情况只是到了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有了较深的认识之后，才有所改变。李鸿章等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带头用“洋人”代替“夷人”，用“洋务”代替“夷务”。“洋人”、“洋务”取其从大洋来之意。

“洋务”即洋人之所务，涉及范围甚广。但是，“洋务运动”中的“洋务”指的没有这么广，只指中国人要学习和引进洋人所务的某些方面，并非洋人所务的一切。梁启超说，洋务“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筑炮台，缮船坞等是也；二曰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等是也。其间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大率皆为兵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户也。李鸿章所见西人长技，如是而已。”^②

“洋务”包括中国需要学习、引进的西方“长技”以及与这种“长技”有关的事务，还包括培养懂得这种“长技”的人才，

① 《鸦片战争》（五）第389页。

② 梁启超：《李鸿章》第11页。

如办学堂、派遣留学生和派人出洋参观等，都是为了培养人才。①“洋务”还包括仿效西方，设立外事机构，使外交近代化。李鸿章视“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②就说明了这一点。

“洋务运动”一词的出现很晚，它是后来叙述这段史事的历史学家的命名，它专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长达三十多年的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近代化运动。它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政治、外交等方面的近代化。

洋务运动起止年限 洋务运动一般以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政府于北京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起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不专为办洋务而设，但办洋务是它的重要职责。因此，它是洋务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

洋务运动迄于1895年“公车上书”前夕。“公车上书”是一次爱国的知识分子的请愿运动，它的主旨是“变法成天下之始”，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起点。虽然洋务运动在以后的日子里以新的形式继续发展，但作为一个历史运动，应以“公车上书”前夕为终点。过去，以甲午中日战争为洋务运动的终点的说法是根据不足的。因为甲午中日战争同洋务运动无必然的联系。

洋务运动与同光新政 所谓“同光新政”，是指同治(1861~1875)光绪(1875~1908)期间执行的新的政策。这个时期的所谓“新政”，就新在办洋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与“同光新政”是同一件事的两种说法。但是在同、光时期，清政府执行的政政策并不限于办洋务，仍然执行陈腐的

① 李鸿章认为：派遣留学生“是筹办夷务之一端”(《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第32页。

②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第11——12页。

“祖宗之法”。如同光时期的外交，无疑有关于洋务运动方面的，但决不能将这三十多年的外交活动都算在洋务运动的范围之内。只有那些为了办洋务而开展的外交活动，才属于洋务运动的内容之一，如为了办洋务，向外国交涉购买机器，引进技术和借款，雇请洋人办厂矿；派遣留学生，派人出国参观访问等等，都是从办洋务的目的出发而开展的外交活动，而那些由于列强侵略所引起的清政府的种种外交活动，即使由洋务派出面与外国人谈判，也不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洋务运动只是同光时期内政的一个主要方面，并非其全部内容。

以上所述，是我们研究洋务运动必须首先从概念界限上明确并统一认识的，以免因概念上的逻辑问题而造成认识上的歧异。

洋务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

洋务运动发生的时候，据不完全统计，此时中国的领土为九百五十九万七千平方公里，人口为四亿多（1863年为四亿零四百九十四万六千人）。由于农民群众遭受清朝统治者的封建压榨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掠夺，他们被迫揭竿而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反抗斗争，严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震撼着清朝的封建统治。

这时，清朝政府统治全国已有两百多年，当朝皇帝是个持政十年的疾病缠身的人，年号咸丰，通称咸丰皇帝。1861年8月22日，他病死于热河行宫。继位者是咸丰帝的六岁儿子载淳。其母那拉氏（1815~1908）是个贵妃，咸丰死后，她和皇后钮祜禄氏都被尊为皇太后（她徽号慈禧，钮祜禄氏徽号慈安），

但她对咸丰帝遗诏以肃顺等八人“赞襄政务”十分不满，就联系咸丰帝之弟恭亲王奕訢和握有京畿一带兵权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兵部侍郎胜保等人，发动政变，处死肃顺等大臣，遂与钮祜禄氏同时“垂帘听政”，夺取了最高统治权（实际上，权操于慈禧太后之手），改元为同治。慈禧太后授奕訢为“议政王大臣”，辅理政事，桂良、文祥等人为军机大臣。1875年1月，同治帝死，慈禧太后又将其妹叶赫那拉氏的四岁儿子载湉入继大统，年号光绪。慈禧太后继续垂帘听政，1887年（光绪十三年）光绪帝亲政，仍由慈禧太后训政；1889年，慈禧太后虽“撤帘归政”，但还是掌握大权。洋务运动就是在慈禧太后专权的岁月里开展起来的。这种状况，既有利于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又使洋务运动的发展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太后专权政治的出现，说明清朝统治权力的衰弱。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下，暴露出满洲贵族的腐朽无能的本质，因而清廷不得不用汉人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以此改变了“总督则汉人无一焉”的状况，以后还出现了“十八省督抚提镇为湘军功臣占其大半”的局面。关于曾国藩的权力，容闳说，“当时七八省政权，皆在掌握。凡设官任职、国课军需，悉听调度，凡若全国听命于一人。”^①清朝的部分军政大权，由满人转到汉人手里，由中央转到“封疆大吏”手里，就为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创造了某些条件。那些开明的掌握了部分权力的汉族地方官员，就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开展洋务运动，并同那些阻碍运动进展的顽固派进行斗争。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一

① 《西学东渐记》第71页。

一个完全独立的中国开始丧失独立性。一个完全的封建制社会开始走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旅程。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表明了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趋势。道光时，资本主义的手工业作坊或工场已经遍及江南各省，如江苏、浙江的丝、棉纺织业、江西的造纸业、冶铁业和景德镇的陶瓷业，广西的造纸业，广东佛山的棉纺织业、铁器业，台湾的制糖业等行业中，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雇佣性质的工人。南京的机户“有开五六百张机者”，雇佣工人达千人以上。长江以北，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也在手工业工场中发生。陕南、川北秦岭大巴山区的铁厂、木厂，每厂雇佣工人也达千人以上，有的“不下三五千”。^①山东济宁六家制烟工场，也有雇佣工人达四千之多。^②由于手工业工场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经济的刺激，农业中也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关系，不仅出现了雇工的富农，而且出现了佃富农，例如山西蒲县的王中孝，他从地主张武高那里租来一块坡地，雇佣了五个雇工替他耕种，工钱每人三千文。^③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十分缓慢，一般说，早在明代中叶，中国社会就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到鸦片战争前后，时间过去三百年左右，仍然只能说是萌芽。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的原因，众说纷纭，但关键性的原因应该是生产力的发展缓慢。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发展为转移的。”^④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

①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

② 包世臣：《安吴四种》卷六。

③ 《清史论丛》第23页。

④ 《列宁选集》卷1，第89页。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后来，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而将其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最后消灭私有制，还要靠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了，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其他社会关系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于中国封建制度的束缚和社会动乱的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积累不起来，不能发展为一种改变封建制度的物质力量。许多新的技术出现了，又消失了，例如指南针，从传说的黄帝和蚩尤作战的时代开始，到宋代，有十多次的反复的发明与消失，不能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生產力量；有的技术出现后，却被后人埋没了，更后的人把它发掘出来，只能把它当作古代的光荣来惊叹和炫耀。美国人于1950年才做到的铬酸盐处理金属表面的技术，中国秦玉早已将它用在制造青铜宝剑上了。新的技术、科学发明往往只是昙花一现，没有来得及成为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的生產力量。于是，生产力无法突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中国封建社会就成了象控制论、系统论所谓的那种超稳定系统。但这种超稳定系统，最终还要靠生产力的发展才能改变。不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对生产关系的某些环节进行调整，生产关系是改变不了的，生产关系的改变只能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相应地进行。

中国封建社会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在明末清初已经出现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趋势。其所以迟迟不能转化，根本的原因在于能促成这种转化的新的生产力尚未出现。农民起义是一个冲击封建制度的力量，但由于农民不和新的生产力相联系，只能在旧社会内部冲撞，找不到真正的出路，即使起义获得胜利，也只是旧制度以某种形式重演。“武器的批判”终究不能代替新的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的建设。所以，

历史向中国人提出的任务，一是要改变封建制度，一是要发展生产力，而封建制度的改变，最终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既然向人们提出了任务，同时也就准备了去完成这个任务的历史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两三百年来在世界许多地区由资产阶级造成的资本主义的时代背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中宣布：“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欧美主要国家都已成为强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俄国、日本也都处在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进程中。一股强大的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席卷着整个世界。资产阶级以“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优势，“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世界各国都从不同的起点，以不同的速度和方式开始了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毫不例外地、无法避免地也被卷到世界近代化运动中来了。除了仇视新法的封建顽固派外，“各阶级、阶层对外国资本主义生产力都表示了各种不同的态度和趋向。从洪仁玕《资政新编》提出广泛采用新法到洋务派的把持新工业，基本上都是欢迎蒸汽机，只是趋向各有不同而已。”^①他们都反映了中国要近代化、要赶上世界先进国家的要求与愿望。先进与落后的矛盾斗争，推动着中国踏上近代化的旅途。

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矛盾，又使中国踏上近代化的旅途具有迫切性。1840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侵略者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强迫清政

^①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37页。

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陷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中华民族要免于灭亡，要图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向西方学习，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推行资产阶级的文明制度。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为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对中国进行掠夺、剥削和奴役。由于这种掠夺、剥削和奴役同先进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同近代物质文明联系在一起，因而外国侵略者就充当了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开展近代化运动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英国等列强为了侵略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结束了清朝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不自觉地使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物质文明，激起了中国某些人跃跃欲试地要变成资产者的欲望。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大量地向中国推销商品，掠夺原料，分解了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经济结构。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初期，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①但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资本家因美棉恐慌的刺激，改进了设备，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生产费用不断降低。到七十年代，英国的织布费用比五十年代减低了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廉价的外国商品使得中国经济“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节约和时间的节省”的优势失掉了。耕织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便加速分解。首先是因洋纱取代土纱使手纺业和手织业分离开来，后又因洋布取代土布，手织业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3页。

与农业分离开来。这种分解从沿海各通商口岸开始，逐步向内地展开。侵略者以变中国为外国资本主义推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半殖民地的卑鄙行为，充当了不自觉地促进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工具。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又出现了另一个分离的历史过程，即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被迫到市场出卖劳动力，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造成了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

外国侵略者怀着卑鄙的目的推销商品，却充当了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的不自觉的推荐者。外国资本家并不想把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授给中国人，但是他们必须出卖这些依靠先进的科技制成的商品。在贸易过程中，这些价廉物美的商品自然会激起中国人对制成它的科技的兴趣和追求。中国人在同外国人进行商品竞争的事实中，逐步认识到，竞争的胜败，关键在于能否使用机器，“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贵，且成功亦难。”^①中国“全用人力，终岁所获，不敌彼一日之工；百夫所营，不敌彼一机之力”。^②当时，一个用机器纺纱的工人的出纱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纺工人的出纱能力的八十倍，一个用机器织布的工人的出布能力，相当于一个手织工人的出布能力的四倍。中国人开始想方设法弄到这些机器。有的外国资本家为了利润不得不有限地出售这些机器。这就造成了中国机器生产必然发生的内外历史条件。

围绕着商品销售和原料掠夺，资本主义列强还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除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银行外，又兴办修船厂、印刷厂以及各种加工厂，如砖茶厂、制糖厂、轧花厂、打包厂、缫

① 郑观应《盛世危言》卷七。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九十九。

丝厂、火柴厂、制药厂、造纸厂以及卷烟厂等等。这些厂在中国起着近代化的示范作用。资本主义列强为了欺骗和压榨中国人民，雇佣了一批中国人做帮手，即所谓买办。这些买办在帮助外国资本家掠夺中国财富的过程中，分沾余利，从而发财致富，有的成了百万富翁。其中许多买办将自己的财富转化成为兴办近代工业的资本，如宝顺洋行买办徐润的部分财富转化成为招商局的资本，宝顺洋行、太古洋行的买办郑观应的部分财富转化成为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资本，怡和洋行的买办祝兰芳先后用自己的财富办起了源昌碾米厂、源昌缫丝厂。买办商人叶澄衷用自己的财富办起了上海第一家火柴厂——肇昌火柴厂。这些买办在与外国资产阶级的接触中，还学习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知识，获得了兴办和管理近代企业的才干。后来许多买办成为开展洋务运动的中坚，如郑观应、徐润、胡光墉、唐廷枢等，后来都成了办洋务的著名人物。可见，外国资本主义出于极卑鄙的目的，在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却为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充当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外国侵略者在战争中显示了洋炮、洋枪、洋船的威力。清政府中一部分有见识的官僚从惨痛的失败中明白了弓、枪、刀、剑已十分落后，不足御敌，必须仿效西洋，制造新式武器。这说明：外国资本主义出于罪恶的侵略目的，使用洋枪洋炮屠杀中国人民，却充当了刺激中国人仿造近代武器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外国资本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还对中国广大农民起了一种惊醒的作用，具有某些西方知识的洪秀全发动了持续十几年的农民战争。由于当时中国生产力的发展还处于落后状况，尽管它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但其所兴所革，始终未能突